

関西大学 大学院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 博士学位論文 令和4年(2022年)度

19D2958 張天皓 ZHANG TIANHAO

戴遂良(Léon Wieger)《汉语入门·第一卷》研究——以19世纪后半期法国汉学为视角

摘要

本文是对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汉语入门·第一卷》(*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河間府, 1^{er} Volume*)的个案研究,旨在将《汉语入门·第一卷》放在19世纪下半期法国汉学的视角下,将该作与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童文献(Paul Perny, 1818-1907)、于雅乐(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梳理出汉学家之间知识传递的脉络,并归纳出《汉语入门·第一卷》相对于其他汉语口语教材的进步性。此外,本文还将戴遂良《汉语入门·第一卷》中的内容与20世纪早期中国语言学家的作品相比较,考察考察中西方学者对汉语语言现象理解的异同。

本文将分为五章。第一章根据一份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文档介绍戴遂良的生平,并结合从 Robert Streit 的目录,介绍戴遂良“汉语汉文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系列的版本情况,最终落脚在《汉语入门·第一卷》四个版本的对比。本文借由第一章的内容为作者及其作品找到一个基本定位。通过本章的梳理,本文认为,戴遂良首先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其次才是一位汉学家或语言学家,因此看待他的作品,也应注意作者的目的性和编写实用性。通过对“汉语汉文入门”系列的梳理以及对四个版本的《汉语入门·第一卷》的比较可以发现,系列作品涵盖范围广,《第一卷》的内容也随着修订愈发完善和独立,这正体现了他作品的实用性。

第二章探讨《汉语入门·第一卷》中与语音相关的问题,结合书中对声母、韵母、声调的描述,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19世纪末献县语音进行进一步探讨。本章通过横向比较认为,19世纪末河间府献县方言中见系声母尚未颚化,但通过戴遂描述可以发现,晓母匣母已经有颚化的趋势。韵母方面,舌尖元音应该只存在[ɿ]而没有[ʅ], [ɿ]后的介音e可能读作[e],今介音[u]在19世纪末献县方言中读作[o]。声调方面,戴遂良明确提出北方方言中只有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四声,入声存在于南方地区。

第三章以《汉语入门·第一卷》为核心,探讨19世纪下半期汉学家们对汉语构词的认识,并考察观点的演变;结合20世纪初6部中国语言学家的作品对汉语构词的认识,比较中西方学者对汉语构词理解的异同。第三章认为,在西方汉学家的眼中,词类是分析构词时最基本的分类依据,所有的构词分析都建立在不同词类的基础。每一类词都可以分为“简单词”和“合成词”,戴遂良在此之上加入了“复合词”的概念,用以指代那些成分关系不容易解释的词。词的构成成分的意义、“词格”和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他们最看重的。与西方人不同,20世纪早期的中国语言学家不太看重词类对构词的影响(这里不包括在法国求学过的马建忠),甚至不探讨构成的词属于什么词类,但比较关注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且从梵文中吸收了一些方法。

第四章从语序和小品词入手，考察《汉语入门·第一卷》中与汉语语法相关的内容。本章认为，戴遂良用“格”的方式理解语序对体词（名词）的影响，并且认为语序的不同会导致词类变化，这明显是受到了罗曼语法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戴氏保留着词类与句子成分一致的观点。“小品词”包括前置词（或短语）和后置词（或短语）。法国汉学家分析小品词的角度有所不同，巴赞、于雅乐是先定位汉语中的前置词（或短语）和后置词（或短语），为他们找到法语表达，这些法语表达又以介词为主；童文献、戴遂良是为法语中的介词寻找对应的汉语表达，这样找到的汉语词则包括方位词、介词、动词，甚至有一些词必须通过固定结构来解释（如在……家）。这样的解释方法同样反映了戴遂良以实用为目标的编写思路。

第五章着眼于书中的用词法，对《汉语入门·第一卷》中的“的”、量词、副词、助动词的定义及用法做集中讨论，借此比较中西方对词类的理解是否一致。本章认为，《汉语入门·第一卷》中的“的”共有6种用法，其中既包括今天的“的、地、得”，也包括两个音变产生的结果（“到”弱化为“的”以及“去”前移为“的”）。戴遂良用 *spécificatif* 指代“量词”，其意义基本与 *classifier* 相同，属于一种特殊的体词，具有区别所限定的体词的功能。戴氏所谓的“副词”实际上不是副词，而是“副词性短语”，基本与状语意义相同。助动词往往具有帮助动词变位和构词两种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汉学家们所说的“助动词”协助变位的功能逐渐减弱，最终留下表示能性的词，逐渐接近现代汉语中的“能愿动词”，构词的功能则依然保留；发展到戴遂良的作品中，助动词的位置也基本固定在主要动词之后。

综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作为传教士的戴遂良在教材编写上突出实用性的原则，这一点在各个部分中都有呈现。就语音而言，法国传教士以法语语音为基础构建注音体系，这为比较法国汉学家记录的不同地方的语音提供了基础；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本文提出的观点，有助于还原19世纪末河间府献县方言语音。就构词而言，西方人按照欧洲语言学的习惯，以词类为分类标准探讨构词；在理解构词法时，总是着眼于构成词的成分的意义、“词类”和格位上。就语法而言，戴遂良描述的语法体系实际上是罗曼语法在汉语上的套用，尽管他极力避免过于生硬，但还是保留了诸多罗曼语法的特点。就用词而言，19世纪下半期西方人对量词、副词、助动词的理解与我们今天都存在不同，因此在功能上也有区别；探讨各词类的定义及功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西方对汉语认识的差异。

如果从本位的角度看，那么本文认为说戴遂良是“词类本位”或“句本位”都是不够全面的，当时的西方人应该尚未建立自觉的本位观念，因此说他们属于何种本位，难免削足适履。尽管本位的研究法存在意义，但贸然用在西方汉学的研究中也恐有不妥。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首次对戴遂良《汉语入门·第一卷》的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并将这部作品放在19世纪下半期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中，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对该作进行分析。本文提到的三部比较对象目前也缺乏细致的个案研究，因此本文能为这三部作品的个案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此外，本文还将西方汉学家对汉语的认识与中国语言学家的观点进行比较，在东西学术的联通上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的附录对一些稀见文献进行了翻译，对之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